

# 读姚远新著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高起元 【沈阳】



近年来的编辑学研究大多集中于构建编辑学框架或侧重于编辑工程、编辑学与新兴学科的联系,尤其是期刊编辑学的研究,便更是如此。然而,姚远却逆潮而行,将视角聚焦于历史的源头,从而大得其获,也使我们借此而领略了另一番天地。

荀子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近期出版的姚远新著《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正是他近十年钻研和积累的结晶。在1990年中国自然科学学报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了写《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史》的计划,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的高度重视,被列为该会科技编辑学研究基金资助重点课题,同时也得到了陕西省教委专项研究基金的资助。从1990年开始,姚远便开始艰辛的学术远征。他出差每到一地,都必定先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由于我国近代科技期刊散失严重,仅存的也多为孤本,很难查找,他总是不怕困难,千方百计去寻觅、去挖

掘。收集资料困难,而对数千张卡片和大量资料进行耙梳整理、构思提纲、写作成书更是十分艰巨的工作。他的研究和写作,都是在出色完成学报编辑出版本职工作之后,在灯下的夜行军。他把自己最宝贵年华的黄金阶段奉献给了期刊史的研究,他把自己的智慧和心血都毫不吝啬地倾注给这项事业。十年磨一剑!姚远终于成功地实现了他的计划。他这种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为广大青年编辑树立了学习的楷模,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纵观全书,《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的首要贡献和价值主要在于,将中国科技期刊史的一个重要成分置于世界科技期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中,第一次作了全面审视。其次是从一块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荒地上找到一个有着重要价值的命题,并对其进行了具有抢救意义的文物考古发掘。再次是该著将区域文化研究方法首次系统地引入编辑学研究领域,从而大大丰富了编辑学方法论的内涵。

个时期,我不知写了多少篇稿子,《伊春日报》几乎每周都能见到我的“豆腐块”文章。有时也编上几句顺口的革命口号,四句凑在一块儿,那时,这就叫做“诗”。最难忘的一次写作是写我惟一的一本长篇小说,每天上山干完活回来,趴在煤油灯下一直写到深夜。还记得小说的题目叫《萌芽》,写的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何战天斗地,建设新林区的事儿,都是我身边的上海知青为生活原型,男女主人公我给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男的许然均,女的叫欧阳永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爱情”是个禁区,两个青年虽然在共同的劳动中,产生了好感,但到小说结束,也没敢让他们谈恋

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友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对不起主人公的。当然,由于阅历很浅,小说最后没能发表。

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形势有所缓和,我被《伊春日报》聘为特邀记者,后来又被《黑龙江日报》社聘为特邀记者,同年,由于成绩突出,受到了报社的表扬,并让我在表彰大会上介绍了如何一边劳动,一边写作的事迹。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当时就小有名气的女作家陆星儿。

1977年,我国恢复了中断十几年的高考,但形势仍像是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那时填表仍少不了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在高考准备中,一心想考中文系的我深怕

政审不合格上不了学,最后,违心地改攻理科,报考了东北农学院。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走进了大学。四年后大学毕业,我分配到省城哈尔滨,在一所专科学校当上了教师,讲“土壤学”和“遗传学”。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如果生活能一帆风顺的话,我的一生也许就这样渡过了。令人意想不到的,1995年坎坷的人生之路使我来到了山西,在这里,我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重新拿起笔,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当上了编辑,名副其实地干起了文字工作。这一年,我35岁。

(作者单位:山西社科院《经济问题》编辑部 030012)

## 一、首次勾勒出我国大学科技期刊文化的立体形貌

本书作者依靠在中国科技史研究经验上的丰厚积淀,对清末至新中国建立 200 余年间的科研机构、学术社团和政府主管部门主办的 2100 余种科技期刊,高校主办的 1400 余种文理综合性期刊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特别是 500 余种高校科技期刊,按区域特征划分为九大类型,逐区、逐校、逐刊地进行个例解剖和分析,并在导论篇中论述了我国古代及国外期刊的产生与发展,在专论篇中又从期刊的时代特征、学科特点,以及期刊的管理等角度加以分析、论述,这样就理清了我国近代大学科技期刊产生和发展的脉络,勾勒出我国近代大学科技期刊文化的立体形貌。像本书这样,对 200 余年间 2100 多种期刊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以往尚未见过。因此本书具有首创性。

另外,本书也对期刊史研究中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关于最早的中文期刊之争,本书否定了传教士 1815 年 8 月 5 日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最早中文期刊的说法,肯定地将创刊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的《吴医汇讲》认定为中文期刊的萌芽,并认为中文期刊的诞生有着两大源流:一为在中国传统的书籍出版和新闻报纸出版土壤中土生土长的传统产物;二为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由传教士创办。

## 二、完成了一项具有抢救意义的工程

我国近代科技期刊的保存时间,长的已逾 200 年,短的也近半个世纪,其中有些期刊的创刊号已湮没无闻或难于寻觅,有些纸质已脆化不敷翻触,相当多的期刊已经散佚。当事人多已作古,在世者亦届古稀,欲采访口头史料,相当困难。本书的突出贡献就是将被湮没的史料挖掘出来,分散的集中起来,无序的系统起来,这的确是一项具有抢救意义的工程。

本书最可珍贵之处是它汇集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准确、系统、可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是今后进行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为他人更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节省了时间。为了提供进一步的研究线索,书中还列出 1949 年以前 30 多所主要大学所办文理科期刊的名细表,涉及 50 余所大学的 1113

种学术期刊,并对总量、文理比例、学科分布、主办单位、创刊时间等作了分析。不少大学可循此线索,寻根问祖,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

## 三、为我国当代科技期刊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我国近现代科技期刊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我国当代科技期刊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的科技期刊就是在那棵老树上长出的新枝,结出的新果。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昭来。像本书第五章所述,清华大学在 20 年代曾一度取消期刊的总编辑和编辑制,改行集稿制,即只将稿件集成付印发行。实行不到 3 年,便形成无人负责,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流弊渐深”,复改回编辑制。清华编辑体制的兴废,使我们看到:编辑始终应为期刊出版环节和质量控制中无可替代的主角。这对于我们今天完善编辑体制,无疑具有真切生动的启迪。

另外,通过对我国近代大学科技期刊史的研究,会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大学科技期刊对于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更加明确大学科技期刊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并且借鉴历史的经验,把今天的科技期刊办得更好。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正在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整顿提高之际,本书的出版便更具现实意义。

## 四、为构建编辑学学科大厦做了奠基性的贡献

建立编辑学大厦是几代编辑同仁的夙愿。在世界上,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从 1908 年便开设有编辑学、新闻事业史、农业工商杂志编辑法等课程;我国在 1919 年,北京大学等校便有人从事期刊史、期刊的功能和新闻出版编辑学的研究及其高等教育工作,我国现在也已有十三所大学开设了编辑学专业。然而,编辑学至今尚未得到社会公认,其学科的完整体系亦未形成。

构建编辑学学科体系大厦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追溯历史,二是探索前沿,二者缺一不可。其实,任何学科的发展,如无这两个支点,都很难独立于学术之林。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其中的第一方面,这项工作做好了,就为编辑学学科体系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非常零散,或较为笼统,专门研究大学科技期刊史者更属凤毛麟角。像姚远这样分区、择校、择刊地对数百年间、百余所大学 500

余种科技期刊编辑过程和经验的精细解剖,个案分析,又要将其置入整个国家大文化背景之下进行对比研究,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是,要建立编辑学学科就必须清家底,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编辑思想、编辑方法和编辑规律。不然,编辑学大厦就如同建在沙滩上一样,会很容易坍塌。

## 五、为编辑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

一个区域、一座城市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与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我国大学科技期刊的产生与发展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因此,作者把以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为主的区域文化引入大学科技期刊的研究是科学的、可行的、有效的。把每个区域的情况逐一搞清了,整个国家的情况也就搞清了。姚远在区域文化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区域科技文化的概念,并对区域科技文化的定义、区域科技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和中国科技文化中心的转移等,都作过系统的论述。正因为如此,他能得心应手地把区域科技方法用于大学科技期刊的研究中。如果没有一个科学有效的方法,面对 200 年间的 2100 余种期刊,将无从着手,无法理出头绪,难以找出规律。本书是运用区域科技文化方法研究我国近代大学科技期刊史的成功尝试。

从空间角度与人地关系上探求大学期刊文化的形态与成因、源地与传播、区域的划置、区分和变迁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上的价值。这对于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和大学期刊如何融入地方经济,并使地域特征成为办学特色和办刊特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本书第十六章指出:“高校学术期刊虽囿于校园,但它跨越时空界限的制约与社会发生广泛联系并成为区域文化的积极因素。”在回答大学期刊的这种地域性特点是让其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呢,还是保持这一问题时,作者明确肯定了后者,并认为“有些事物的特点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会逐渐淡漠,但任何事物的地域性特点却可与天地同在”。这就为我国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要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的改革举措提供了历史的理论依据,同样,这也是大学期刊发扬区位优势,利用地方历史文化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或工矿农业布局优势而形成办刊特色的理论依据。